

編後語

當下新媒體不僅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深刻地塑造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認知，更成為不同黨派立場人士宣傳與動員的競技場，造成的影響既深且廣，本期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的三篇文章就此議題予以多角度探討。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，在新媒體大行其道的背景下，催生了影響不亞於新冠肺炎的「信息流行病」(infodemic)，涉及政治、社會等不同層面。胡泳從傳播、心理以至媒介技術等角度，對「信息流行病」的傳播機理作出全面的剖析，指出真假混雜的信息廣泛傳播令人難以確定真相，讓另有用心的人操作後真相政治。劉海龍從全球語境回看中國宣傳模式的轉變，指出中國經歷了從宣傳1.0到3.0的升級轉型：從過去一元化、運動式的宣傳模式，歷經建立在社會科學基礎上的公關宣傳，再到近年充分利用新媒體、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等技術，佔領新興輿論陣地。常江關注的是中共十八大以來國家宣傳工作呈現的新特徵，包括建構流行化的文宣產品、打造「商業—道德」合一的「新偶像」，以及改造青年亞文化，政治宣傳效果體現美學化的傾向，具有鮮明的民粹主義色彩。

在後真相時代，網民有沒有足夠辨識事實的能力？馬得勇基於網絡調查的實證研究給出了初步回答。文章以新聞專業主義為切入點，探討中國網民的信息認知能力與輿論態度：近八成網民贊成媒體應有獨立地位，惟其中約三成存在價值偏好與現實選擇不一致的情況；調查顯示，即或在同一價值的支配下，由於信息認知能力差異，人們在眾多議題上容易產生巨大分歧，以致成熟的公共輿論場域難以形成。黃佩映的香港農業媒體論述研究，是一個揭示另類媒體如何成功塑造社會想像的重要案例。自2010年以來，由於受到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影響，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萌生了一種挑戰新自由主義話語的農業想像；儘管其內部並未形成統一的價值聚合，然而在香港公共輿論中業已佔有一席之地。

近年中日戰爭研究的一個探究方向是有關戰時「合作者」(collaborator)扮演的角色，以往的討論較多集中於日軍與地方頭面人物關係的研究。朱燾以溫州樂清的基層社會為案例，基於豐富的中文和日文檔案材料，展示日軍如何借助地方宗族勢力、改革保甲等策略，滿足資源汲取的需要，以體制化的方式重構鄉村秩序。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以來，「勞動教育」至今仍是一個饒富現實意義的話題。石岩以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學教育為中心，指出建國之初「勞動教育」的意涵較為寬廣，惟其後定義愈益窄化，從最初主張「腦體並用」到後來提倡體力和農業勞動，成為一整代學生成長的必經歷練，造就了1960年代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。